

—巴黎文丛—
阎纯德 主编

我的『七〇』
印迹

白乐桑
著

Empreintes chinoises



大象出版社

——
巴黎文丛

——
阎纯德 主编

我的“七〇”印迹

Empreintes chinoises

白乐桑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七〇”印迹/白乐桑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4. 1

(巴黎文丛/阎纯德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7975 - 6

I. ①我… II. ①白…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6828 号

巴黎文丛

我的“七〇”印迹

阎纯德 主编

白乐桑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钟 骄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6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 65957860 - 351

法兰西的诱惑

——序“巴黎文丛”

对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法兰西的诱惑堪称世界第一。在文化人的眼里,其诱惑除了历史上那位多次击败反法联盟和镇压反动势力并捍卫了法国大革命、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官、颁布《法国民法典》、奠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拿破仑,以及领导法国人民抗击德国侵略、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和“戴高乐主义”的戴高乐,法兰西的魅力更在于那些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编织的由“陈年旧事”组成的灿烂的文化风景。

中法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艺复兴中后期,欧洲视中国为“修明政治之邦”,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好感,遂兴起“中国热”。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互示理解与友情之后,汉学作为文化形态开始影响西方文化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同时,法国在历史、文学、艺术与科学诸多领域,也成为中国人最为追慕的国度。

“巴黎文丛”诞生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是有意而为,也是无意巧合。1993 年我开始在学海“游泳”,当游到蓝色海岸时,惊异地发现法国汉学的风光特别璀璨,遂勾起我对当年在法国执教时许多往事的回忆。20 年来,我一直想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将历史上那些中国学者和作家借助文学所再现的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风情的著作钩沉出来,一展密切的中法文化关系。我想到陈季同及其之后的敬隐渔、曾钟鸣、盛成、梁宗岱、袁昌英、陈学昭、冯沅君、陆侃如、苏雪林、戴望舒、闻家驷、傅雷、郭麟阁、齐香、罗大冈、李治华、张若名、王道乾等,也想到活跃于法国文坛的程抱一、张宁静、卢岚、桔子、萧良、黄育顺、吕大明、蓬草、绿骑士、黄晓敏、山飒、戴思杰等作家,还有著名学者柳鸣九、郑克鲁、沈大力、董纯、李

玉民、袁树仁、钱林森、孟华、郭宏安、余中先、金丝燕等。他们大多两栖于文化与文学之间，都在为两国的文化精神“立传”，是一直忙碌于中法文化交流的可敬的架桥人和摆渡者。

2013年我到巴黎闲居，在筹划“法国汉学研究专辑”之《汉学研究》时，这个孕育已久的想法又活跃起来，于是诞生了编辑出版“巴黎文丛”这个创意。在熙熙攘攘来往于北京与巴黎之间的学者和作家中，不少人都是一流的法国文学翻译大家和作家，他们的辛勤耕耘，使中法文化长河两岸的景观日益赏心悦目。

“巴黎文丛”很像一次关于法兰西的文学笔会。与会者所带来的作品分别是柳鸣九的《塞纳河之灵》、沈大力的《法兰西风云录》、董纯的《巴黎镜花缘》、李玉民的《法兰西之吻》、白乐桑的《我的“七〇”印迹》、郑园园的《和法国文化的美丽约会》、吕大明的《生命的衣裳》、蓬草的《七色鸟》、绿骑士的《花都调色板》、黄晓敏的《波光掠影法兰西》、岑咏芳等的《巴黎意，故乡情》和阎纯德的《在巴黎的天空下》。这些作者基本都通晓中法两种语言，深谙中法两种文化，多是神奇的“画师”，他们自拟文题，用其或朴实或高雅的笔墨，从不同的视角，既形似又神似地描绘了他们所认识的法兰西精魂。

“巴黎文丛”中只有《我的“七〇”印迹》的作者是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他写自己留学中国的生活，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被前任法国驻中国大使苏和先生称为是具有开拓性的好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美和源远流长。在书中，作者“既用一种西方的眼光看中国，同样也用一种亚洲的目光看西方……这正是一种相邀，彼此要加深理解，进一步考虑究竟是什么拉近我们，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中国人和法国人，彼此同样吸引，相互默契，往往共谋大事”。

读“巴黎文丛”很像乘坐旅游车观光，既可在时光隧道里读历史，又可在纷纭社会中看现实。总之，“巴黎文丛”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了法兰西的魅力与诱惑，同时也是对法兰西精神的记录与诠释。

阎纯德

2013年12月14日于北京

激情发现:白乐桑开拓性的好书(代序一)

一种慧心的激动,只为看到一些“印迹”描绘得如此鲜明,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丰美和源远流长;只为发现一些基本概念表述得如此精当,标识并解码中国文化,还借助双重目光而事半功倍。既用一种西方的眼光看中国,同样也用一种亚洲的目光看西方、它的价值观乃至“野蛮”[暗指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 1899~1984)的旅行笔记《到亚洲的一个野蛮人》]。这正是一种相邀,彼此要加深理解,进一步考虑究竟是什么拉近我们,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中国人和法国人,彼此同样吸引,相互默契,往往共谋大事。这就是本书首要的效用。

一种审美的激动,只为重新发现一些词语和概念的含义、义符文字的诗意、对朴素美的共同喜爱、先于理性的感性至上。多么美好的篇章,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令人堪忧,日益以冰冷的计算为标志的社会现实中。

一种情感的激动,近乎普鲁斯特式。法国作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在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中,讲述他吃一种小蛋糕时细品的味道,唤醒了他早年的记忆;并又发现一些味道,忆起已经半遗忘的印象和感觉。这些感觉和印象,我也有过同样体验,大约在同一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我作为年轻的外交官,来到这个当年万难进入的中国社会。也同样观察到,尽管经历几十年的大小悲剧、痛苦和怀疑,多

少世纪以来造就中国崇高声望的价值,却能够超越时间,完好无缺,仍然富有活力。

我国越来越多的人,特别受益于本书作者展开的活动,发现或者愿意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有许多人愿意通过别人的领悟来加深对自身的认识。我向所有这些人所能推荐的最好借鉴,莫过于这种自发而坦诚的、明察秋毫的目光,莫过于这些小步走向理解对方所留下的“印迹”。

苏 和

2007年6月7日于北京

比较留学(代序二)

一位法国友人要在中国出书,用中文记述他的留学经历,邀我友情出场,写一篇序言。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就痛快地应承,一见书稿,杂杂沓沓这么多“印迹”,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在《中国印迹》(法文版)之后,首先看到的小标题《第一批交换生》,让我怦然心动,何不比较一下我们的留学呢?

第一批交换生,算起来并不始于1973年,还要往前推9个年头。

那是1964年,中国和法国恢复外交关系仅过一个月,就重新启动了旧中国时一项文化交流协定:两国分别接待对方20名留学生,负责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有幸忝列这20人小名单,当时称为“进修生”,大多是北京大学等院校的年轻法语教师,以及外交部要培养成为高级翻译的应届毕业生。也是11月份,我们尚未启程,20名法国留学生就先行抵达北京。法国第一任驻华大使宴请了中、法两国第一批留学生。

我说“小名单”,是对新中国首批公派留法学生的大名单而言,即1964年和1965年,我国政府又从应届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中,挑选了200人送往法国学习。现在出国留学方兴未艾,但是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文革”前我国政府的空前之举,将一大批学生,约有700名,派赴法国、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留学。他们回国分配到各个领域,后来大多成为栋梁之材。

比较我们的留学,有一个共同点:破冰之旅的紧张,这是现在留学所体验

不到的。

白先生等法国学生 1973 年 11 月来到北京,正值中国处于“文革”的胶着状态,各种力量还在暗中较劲,思想的弦人人都绷得很紧,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酿成“严重后果”,而“外交无小事”,更是处理同外国人关系的一大原则和警言。“文革”以来,首次接待外国留学生的校方,神经的紧张程度便可想而知。他们管理外国留学生的宗旨就是不出事,而保证不出事的最有效措施,就是“隔离”。法文有一个词 la quarantaine,本义为“40”、“40 天”,转义为“检疫隔离”,就是这个意思。

白先生来到心仪已久的神秘国家,怀着法国青年的一派天真,真心诚意要融入这个让他们找不到北的社会。殊不知他们所踏上的古老土地结了坚冰,在“批林批孔”的政治口号明确指引下,就连中国人也找不到北。

走在坚冰上的白先生浑然不觉,还以为中国北方的大地冬天本就该如此。因而,他在天津街头被上百人围观,视同外星人,平日要好的中国同学态度忽然变得冷淡……屡屡碰见这类怪事,他百思不得其解。

想要融入的愿望,却撞上“隔离”的南墙,还不知回头。最有趣的事,就是他们贴大字报的那一幕:几名外国留学生,趁着夜色,将一份大字报贴到批判孔夫子的大字报栏上,然后又溜回宿舍。鬼鬼祟祟,就仿佛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其实,他们在大字报上只是提出:“我们,外国留学生,也要去农村锻炼……”入乡随俗,什么都想尝试一下,这正是法国青年的可爱之处,虽然不那么慷慨激昂,但比起我们的许多政治表态来,倒是由衷得多。

这一节的小标题是《愤怒》:校领导发怒了,说他们行为的性质“很严重,已经插手到中国的内部事务来了……”要求像中国学生一样去农村锻炼,怎么就定性为严重事件,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读到这一节多少就能明白“文革”时期的思维逻辑。

与其说那位校领导是“愤怒”,不如说是“恼怒”——恼的是外国留学生多事,给他找事,正可谓“多情反被无情恼”。至于他那几声干笑,则属于文化层

次,下面还要谈及。

白先生留学的“印迹”,有一些是留在坚冰上了;我们的赴法留学却如履薄冰。

新中国首批赴法留学生,行前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打足了“预防针”,以对付形形色色的反华宣传,挫败各种敌对势力,尤其是美、蒋特务的策反阴谋。这并非空穴来风,捕风捉影,当时国际形势非常紧张,“越战”正酣,我国全力支持“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死敌;而且中、法刚刚复交,台湾政权的许多机构和人员还留在法国。这些敌对势力不会死心,一定会打没有经验的中国留学生的主意。

我们当然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首先坚持集体行动,上课、吃饭、购物、旅行,至少要两人同行。还真出现过“敌情”,有一次就很严重,有人在大学食堂门口散发反华宣传单。我们立刻出动,在大学食堂门口便形成我众敌寡之势,两个人揪住一个辩论,当众撕毁宣传单。他们有四五个人,是法国右翼学生组织和南越的留学生,借“越战”污蔑中国侵略,要破坏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良好声誉和影响。

这并不是孤立现象。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走在僻静的街道上,迎面走来两个黑人,估计是美国留学生,擦肩走过之后,我听见其中一个说了句:Chine dog! (中国狗)我当即转身,厉声反击:Coquin! (流氓)这是我唯一能脱口而出的骂人话。当时白先生若是在场,就会指出,17世纪的人骂人“混蛋”才会这样讲。但是不管怎样,那人心虚,想必从我的声调听出来是回敬他。他转过头来,相隔几步同我怒目对视,我已经握紧拳头,毫不畏惧比我们高大的两个黑人。对视了不下十秒钟,那人摇了摇头,首先移开了目光,扬长而去,不知是害怕中国功夫,还是被我的凛然气势吓退了。

虽然校方极尽地主之谊,大多数法国人也对我们很友好,但是法国当局和中国学生毕竟初次打交道,彼此还不摸底,难免相互有所戒备。据说我们的宿舍可能安装了窃听器,我们开会时就打开收音机,有时干脆转移到浴室里,真

有点电影中搞地下工作的意味。

是否安装了窃听器,也无从查证,他们想试探我们,却是千真万确的。有一回,那应是1965年复活节放假期间,我和一个同学去巴黎北郊,不留神坐过了站,下来等回程车,忽见一个50岁模样的先生上前搭话:“你们是中国学生吧?对核技术感兴趣吗?这附近有个研究所,我可以提供资料。”我回答说,我们不懂什么核技术,只对法语和文学感兴趣。那人似笑非笑,一脸诡异的神色走开了。

后来,我们怎么分析也无法判定他是什么人,有何用意,有这样笨的反间谍人员吗?莫非高卢式的幽默,抑或是半神经病吧?他怎么就知道我们是中国留学生?为什么同我们一样,滞留在无人的小站上?种种不可解的谜团,闹得我们本来就紧绷的神经绷得更紧了,我们也更加严格地遵守集体行动的纪律。外出偶尔落了单,我就特别紧张,总要尽快回到集体的怀抱,一路不断回头张望是否有人跟踪,就好像随时会被人绑架似的。

我们留法学生坚持集体行动,也的确保证了安全,两年后悉数回国,一个也不少。然而,在法国形成中国小社会,却是留学的大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留学的意义。40多年前那样做,自有迫不得已的外因,而现在大批自费出国留学的人,还总是抱团,融不进当地人的生活,极大地浪费留学的机会和昂贵的经费。

同样是破冰之旅,比较而言,我们就缺乏白先生的那种求学精神。他深信在生活中学到的远比书本多,要通过旅行去发现。白先生能成为知名的汉学家,同他当年的求学精神密不可分,是他“自我汉化”的必然结果。

然而“自我汉化”谈何容易,尤其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定的环境。白先生在中国的“印迹”,可以说是闯关的“印迹”,闯过政治的隔离、文化的隔阂所留下的“印迹”,闯进生活、深入工厂、下到农村,直接体验普通中国人生活所留下的“印迹”。一个中国通,就是这样炼成的。像白先生这样的一批汉学家,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要比我们国人的努力有效得

多,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和赞赏。

看来白先生很贪吃,本书近十篇的小标题都与吃相关,其中一个标题《吃与消化》很有代表性,贪吃还要消化得好。他从惊奇于西红柿拌白糖,到看出“盘子里的哲学”,在品味中国美食的同时,也在大吃大嚼并消化中国文化。

白先生胃口大,还不忘口,即使有的初尝不大对口味,他也要仔细品尝,咽下消化,这一点难能可贵,不像有些人浅尝辄止,只会贩卖一点中国文化的皮毛。

白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确品出了滋味。本书后半部分许多篇目,如《模糊的逻辑》、《汉字》、《书写和空间思维》、《语言文字与一个民族的思想》等,都引起我的兴趣。他开始学习汉语背后约定俗成的东西,进而探问中国文化的底蕴,提出问题的本身就很有见地,而且引而不发,留有充分的探讨空间。

白先生不断地探问,摸到了汉语的脉络,许多章节都有端倪可查,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本书用地道的汉语写成,没有西化的痕迹。反观我们一些译者,独创出一种西化的汉语,还美其名曰保留原汁原味,无异于白先生在书中提到的“邯郸学步”,既丢失了母语,又未得原著的精髓。

在汉语的研究和教学中,白先生所做的试验和调查很有趣,也很有意义。他拈出法国诗人米修评论汉字的话:“思维的魔法”,“汉字是开放的,并且通向好几个方向”。真不愧是诗人,一语道破了“诗的语言”的奥秘。“魔法”者,“灵变”之谓也,天马行空,少受语法的羁縻,词形不变却生万变,而万变又不离其宗,总合阴阳之道,体现抑扬之美。

汉语最大的特征就是造词、造语、造句同出一法,既简单又自由;与法语相比,词性活,语式活,文法活。“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如用法文表达,就复杂多了,没有这种韵味和轻快之感。然而,唯其简单而自由,汉语又常受诟病,说是“模糊”、“不完整”、“不精密”等等。

白先生已经发现,每个语句的不完整,恰恰构成整体的和谐。至于“模糊”、“不精确”,这是每种语言的天然属性,法语语法很精确,词语就未必,我

翻译法国文学名著时,经常碰到使用频率特别高,又无可替换的一些词。写“美”就是 beau(美), joli(优雅), 或者 gracieux(优雅), 译成汉语就费脑筋细化,要从不同品格和分类的数十个词中,选择最贴切的一个,或是秀美,或是俏丽,或是妩媚……如果表现女性美的话,通篇都译成“美女”,那会成何文字。

从结构来讲,与形合的法语相反,汉语是意合,遣词造句靠的是意会,而不是语法规则,汉语这种义符文字,这种意会语言,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如何影响中国的文化艺术,这是很大的课题,尚待深入研究。

汉语字里行间存在的这种意会,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能否下结论为“模糊的逻辑”,还值得商榷。不过,汉语模糊语的妙用,乃至滥用,则远甚于法语,这属于文化和社会范畴的问题,却给懂汉语的外国人造成汉语“不易捉摸”、“模棱两可”的印象。我的一个法国朋友每次见面总向我抱怨:“跟中国人打交道,你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没有白乐桑的汉语功力,“听话听声,锣鼓听音”。

最常见的模糊语,就是领导“打官腔”,人际关系和生意场上的“忽悠”,都极大地运用了模糊语的广延性。“组织上会考虑的”,这是领导打发人的冠冕堂皇的话,最让人无可奈何:一说“组织”就可能没人负责,一说“考虑”就意味猴年马月。

再说白先生特写一笔的那位副校长的几声干笑,这一实例再次说明,表达“笑”的词语,法语少而空泛,汉语繁多而细腻。这并不是说,古代高卢人没有那么多笑的表情,也许法国囿于拉丁语词源,不如汉语这么方便造词;也许文化上没有这种需要,完全让幽默占尽了风头。我非常喜欢法国式的幽默,从莫里哀、伏尔泰,到马塞尔·埃梅笔下的人物,滑稽幽默中何尝没有透出奸笑、巧笑、哏笑、浪笑、淫笑、惨笑……只是没有点睛之词。

古人云:“哭是常情,笑乃不可测。”那位副校长的干笑,应当说感情很复杂,笼统来看是恼怒,想必还夹杂着尴尬、好笑、做戏等成分。外国留学生的一次“革命行动”,反对也不是,赞成也不是,总归是尴尬事,心中未免感到好笑,

还要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文革”常态),以做戏的干笑掩饰这一切。做戏给谁看?给那段历史。西方有笑的艺术,中国有笑的文化。

即使在那段特定的历史阶段,白先生留学也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坦诚、坦荡,走进、融入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登上中国文化的殿堂,深入那迷宫似的暗道密室。这种心态,可惜我留学那时难以具备,因此,我也就格外赞赏和钦佩。

因工作关系,白乐桑经常来中国,我们每年总要见上几次面。我感叹他能成为中国通,而我仅限于文学翻译,成不了法国通。他说我们左右大脑发展不同,他偏重口语,我偏重文字,各有所长,不能兼得。现在,《中国印迹》(法文版)出版,又见其文字功夫,白乐桑给了我一个惊喜,莫非他的左右大脑都发达起来了?

李玉民

2007年6月12日于北京花园村

我的老师白乐桑(代序三)

白乐桑(Joël Bellassen)老师是法国人,又不是法国人,他在家宴客的时候,除了正宗的法国奶酪,还会有正宗的山西老陈醋。白老师不是中国人,又是中国人,他不仅深谙中国的风土人情,而且能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字正腔圆。他常常说:“我是汉化的法国人。”由此,我不由得会想起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关于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宏论,陈先生不是还说过“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的话吗?顺着陈先生的思路,我想,白老师不就是中、法文化交融的活生生的体现吗?

一直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白老师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你为什么选择学习汉语?”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中国还是蒙着面纱的神秘国度,学习中文,写方块字,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最近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我学习汉语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别人问我,你为什么学习汉语。”

白老师对汉语教学的热爱是深沉而真挚的。近年来,汉语教学在法国发展很快,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使学汉语成了法国学生的就业王牌。汉语教学大踏步地走入了法国的中学和小学,越来越多的法国学生参加了高考汉语科目,学习汉语的学生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作为全法国的汉语教学总督学,作为法国汉语教学的总设计师,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我是汉语的传教士。”

我有幸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常和他一起探讨有关汉语教学的问题,从而能够深入了解和体会他的睿智、严谨与豁达。他给法国的汉语教师开讨论课,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对于不同意见,他会首先肯定对方的逻辑思路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不会因为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同而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他的眼光看得很远,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所以听他谈话的人常常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法国的一批年轻教师就是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走上了汉语教学的道路,共同撑起法国汉语教学的一片天空。

白老师最早在巴黎第八大学学习汉语,20世纪70年代作为法国教育部钦点的第一批交换生来到红色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和哲学,体会原汁原味的东方文化。这种文化,在当时闭塞的对外交往条件下,曾经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向往,鼓舞着一批最早跋涉于方块字中的外国年轻人去揭开那个辉煌了千年的东方大国的神秘面纱,时年23岁的白老师就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个。

他和其他的外国同学一道,和中国学生同吃同住,上山下乡,干农活,向学校领导请愿,贴大字报。这本书记录的是他在那个年代简简单单的故事,他作为一名普通留学生的所思所想。第一次喝白开水,第一次看到凉拌西红柿里放的是白糖,第一次去王府井买鞋子受到围观……许许多多的第一次使他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也使他这位吃长棍面包和奶酪的法国人,和中国文化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本书所写的内容都是白老师的亲身经历,其中部分内容曾以《中国印迹》(法文版)为名在法国出版,由我翻译成中文,有的文章是白老师口述,我记录整理的。白老师亲切幽默的文字、生动形象的描述,配以当时的照片、家信,鲜活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外国人眼中的那段特殊历史,是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的。

白老师不仅经历了那段特殊的岁月,而且也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巨大变化,他对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一往情深,日久弥坚。他30年如一日,在法国讲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每年都带洋学生来中国,努力让更多的法国人了解汉语。他钟情于每件和汉语有关的工作,风风火火,活力四射。

2006年3月1日,法国教育部召开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宣布任命白乐桑先生为首位专职的汉语总督学,中国驻法大使和教育参赞同来致贺。法国的汉语教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那一天,巴黎的太阳很好。

我开玩笑说:“白老师,国内关于正式任命总督学的报道很多,您现在和雷锋一样是中国的名人啊!”白老师笑了:“哪里,哪里,我只是汉语教学事业中的一颗螺丝钉。”

俞文虹

2007年3月31日于北京